**摘 要**

中国社会自二十一世纪开始面临老龄化和少子化两大困境，尤其农村老年人一直处于社会保障之外，直到2009 年政府试点新农村养老金计划时得到一定程度保障；此外针对少子化问题，我国也在2015年的会议上提出了全面“二孩”政策，以期解决问题，提升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减缓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步伐。

生育和养老方面的两项政策重点关注人口金字塔的一头一尾，而全面“二孩”政策通过对家庭养老模式和经济决策影响着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的需求，为了探究该影响机制并更好地协调两项政策使得发挥更大的作用，本文利用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年及2018年的两期数据，评估全面“二孩”政策对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需求的影响，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研究发现：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抑制了政策目标家庭的社会养老保险需求，通过工具变量模型进行识别得出：（1）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政策效应是净负效应， 提高了目标家庭的当期消费，降低了其新农保参保率；（2）全面“二孩”政策通过改变子女数量使养老模式回落至家庭养老，降低其新农保参保率；（3）不同地区的政策反应程度不同，其中中部和西部的显著程度高于东部。

基于回归分析结果，政府应当通过提升农村的经济教育，提升家庭经济决策能力与抗风险能力，此外也需提升性别教育，转变传统“养儿防老”的养老模式，协调农村地区的生育与养老政策，同时鼓励农村地区推进个人养老金改革。

关键词：全面“二孩”政策；新农保；工具变量

**ABSTRACT**

Since the 21st century, Chinese society has faced the dilemmas of aging and child reduction. In particular,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have been outside of social security until the government piloted the new rural pension scheme in 2009. Meanwhil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hild reducti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lso proposed a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at the 2015 conference, hoping the policies can increase China's total fertility rate, and slow down the pace of entering an aging society.

The two policies on childbirth and old-age care focus on two ends of China’s population pyramid, while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affects the demand for old-age insurance in rural family society through the social norms for supporting the elderly and family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mpact mechanism and better coordinate the two policies to play a greater role, this paper uses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data from 2016 and 2018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on the demand for pension in rural family society,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 response to the problem.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has suppressed the NRPS demand of the policy target families, and it is identified through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model: (1) The policy effect of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is a net negative effect, which increases the current consumption of the target family and reduces NRPS participation rate; (2)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made families turn to supporting elders by raising male offspring instead of NRPS by changing the number of children, thus reducing NRPS participation rate; (3) The degree of policy response in different regions is different, of which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eastern region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government should enhance the family's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ability and risk resistance by improving economic education in rural areas. In addition,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gender education, transform the traditional “raising children to support the elderly” model, and coordinate the birth and old-age policies in rural areas. At the same time, encourage rural areas to promote personal pension reform.

KEY WORDS：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NRPS; Instrumental Variables

目 录

[第1章 引言 1](#_Toc129618110)

[1.1 研究背景 1](#_Toc129618111)

[1.2 研究意义 3](#_Toc129618112)

[1.2.1 理论意义 3](#_Toc129618113)

[1.2.2 现实意义 4](#_Toc129618114)

[1.3 研究内容 4](#_Toc129618115)

[1.4 研究方法 5](#_Toc129618116)

[1.5 创新点与不足 5](#_Toc129618117)

[1.5.1 创新点 5](#_Toc129618118)

[1.5.2 不足 5](#_Toc129618119)

[1.6 国内外文献综述 5](#_Toc129618120)

[1.6.1 国外文献综述 6](#_Toc129618121)

[1.6.2 国内文献综述 7](#_Toc129618122)

[1.6.3 文献综述评述 11](#_Toc129618123)

[第2章 关键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12](#_Toc129618124)

[2.1 相关概念 12](#_Toc129618125)

[2.1.1 全面“二孩”政策 12](#_Toc129618126)

[2.1.2 新农保 12](#_Toc129618127)

[2.1.3 代际交换 12](#_Toc129618128)

[2.2 理论基础 13](#_Toc129618129)

[2.2.1 资源约束与生命周期理论 13](#_Toc129618130)

[2.2.2 父母效用函数——非利他性与利他性模型 13](#_Toc129618131)

[2.2.3 工具变量理论 14](#_Toc129618132)

[第3章 全面“二孩”政策与新农保政策概述 15](#_Toc129618133)

[3.1 全面“二孩”政策概述 15](#_Toc129618134)

[3.1.1 机构组成 15](#_Toc129618135)

[3.1.2 全面“二孩”政策概述 15](#_Toc129618136)

[3.1.3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纵横向分析 17](#_Toc129618137)

[3.2 农村家庭养老保险概述 19](#_Toc129618138)

[3.2.1 政策背景 19](#_Toc129618139)

[3.2.2 具体实施 19](#_Toc129618140)

[第4章 全面“二孩”政策对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需求的影响机制分析 21](#_Toc129618141)

[4.1 全面“二孩”政策通过子女数量影响家庭养老模式与经济决策 21](#_Toc129618142)

[4.2 养老模式与经济决策影响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需求 21](#_Toc129618143)

[4.2.1 中国农村家庭养老模式的转变——向“养儿防老”回落 21](#_Toc129618144)

[4.2.2 经济决策影响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需求 22](#_Toc129618145)

[4.3 影响机制分析路线图 23](#_Toc129618146)

[第5章 实证研究设计与结果分析 25](#_Toc129618147)

[5.1 实证研究设计 25](#_Toc129618148)

[5.1.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25](#_Toc129618149)

[5.1.2 变量选取 25](#_Toc129618150)

[5.1.3 模型构建 26](#_Toc129618151)

[5.2 实证结果与分析 26](#_Toc129618152)

[5.2.1 描述性统计 26](#_Toc129618153)

[5.2.2 概率单元回归结果确定因果关系 27](#_Toc129618154)

[5.2.3 工具变量法 29](#_Toc129618155)

[5.2.4 弱工具变量检验 29](#_Toc129618156)

[第6章 结论与建议 31](#_Toc129618157)

[6.1 结论 31](#_Toc129618158)

[6.2 建议 32](#_Toc129618159)

[6.2.1 政府完善新农保体系，进行农村家庭经济教育 32](#_Toc129618160)

[6.2.2 完善政策衔接 32](#_Toc129618161)

[参考文献 34](#_Toc129618162)

[致 谢 37](#_Toc129618163)

[个人简历 38](#_Toc129618164)

1. 引言
   1. 研究背景

生育政策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最为重要的政策之一，它不仅决定着政策试点与执行的一段时间后的人口发展趋势，还影响着包括人口的规模、结构及质量等在内的各方面，从建国初期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我国的生育政策发生了翻覆的变化，对人口的现状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人口控制政策，属于基本国策。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71年，全国总人口达8.52亿，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高达30.7‰和23.4‰，经历了“最多两个”到“一胎化”，1982年9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同年12月写入宪法。主要内容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而达到有计划地控制人口的政策目的。这项政策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例如：提升中国人口质量、控制过多人口。

然而，它在生育行为以外也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后果，例如：­­难以用数据衡量的受政策冲击的妇女的心理问题及健康成本，和失独家庭遭受的巨大损失（Alpermann，2020）；性别比严重失衡，早在2005年，中国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已经达到118.9:100，男性比女性多近20%，而截止2022年，中国的男性比女性要多3237万人；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全国总人口达13.4亿，总和生育率仅为1.18%、处于世界最低水平（以上数据均出自国家统计局人口普查或抽查结果）。

此外这项政策也造成中国[“421”扭曲型家庭结构](https://zh.wikipedia.org/wiki/421%E7%BB%93%E6%9E%84)（家庭中的两位父母、四位祖父母的扶养责任均由一名独生子女承担），新的人口结构给我国传统家庭的“养儿防老”模式带来巨大冲击。在“制度养老”模式缺失，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较薄弱的农村地区，家庭是最主要养老最主要的经济和精神扶持来源，然而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这些家庭中父母的养老需要不再能经由低数量子女的供养得到有效满足，2005年至2015年，十年间我国老年人抚养比从12.2%升至14.2%，上升了2个百分点，同期儿童抚养比降至22.6%，下降了5个百分点，抚养比的结构变化让年轻夫妇背负沉重的扶养负担，而这些负面后果都直接或间接地致了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也让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使之成为中国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图1.1 1953-2020年中国常住人口老年人口及少年儿童抚养比

1986年，我国开始探索实施农村养老保险，其中历经了试点阶段、停滞阶段、新农保初探阶段和全面实施阶段。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农村老人的晚年生活，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从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农村老人的数量越来越多，再加上经济的发展，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打工，家庭养老的基础受到了冲击，老年人的生活保障出现了困难，中国农村养老保险也受到了很大的挑战，日益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能否解答这一问题，积极地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和农村社会风貌，同时深刻影响中华民族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伟大复兴进程。

为积极应对持续低生育导致的日益严峻的老龄化困境和少子化问题，优化调整人口结构，在2013至2015年间，中国政府先后实施了“单独二孩” 和“全面二孩” 政策。2013年12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规定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在政策施行后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即“单独二孩”政策。 “单独二孩”政策遇冷，为了进一步修正人口结构失衡，在“单独二孩”实施两年后的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又明确提出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此后所有夫妇都可以生育两个子女。

“单独二孩”政策出台之际，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预测，每年我国将新増200万人口，然而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一年期满的2014年，全国申请生育二孩的家庭数量仅为105.4万，远低于官方所预测200万。由此可见，“单独二孩”政策的效果并不突出，甚至可以说是“遇冷”，党和政府及时对此做出调整，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指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老龄化行动。”

这一政策被称为全面“二孩”政策。全面“二孩”政策是继“单独二孩”政策之后，我国在计划生育（birth control）政策领域的又一重大改革。全面“二孩”政策的目的在于缓解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改善人口结构，缓解劳动人口短缺的不利局面，同时使过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回落，最终提升我国的总和生育率。研究表明，“全面二孩”政策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方面影响：第一，通过影响家庭经济决策影响养老；第二，通过影响养老模式影响家庭养老，其中谭燕芝，李维扬（2018）研究发现农村家庭的生育行为中有明显的子女性别偏好，且缺乏制度化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生育男孩——养儿防老”依然是我国农民当下的无奈之举（李笼彦，2011），生育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们参加“新农保”的意愿。

现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虽然有了一定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老龄化所带来的危害，但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譬如养老保险基金空账、覆盖面较窄、农民参保积极性不高等又是我们所无法忽视的，它们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成效。在农村空巢老人越来越多，且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已不能适应现代化及城镇化进程下的养老需求。而新农保养老金部分取代了农村家庭子女提供的代际支持。中国农村的老龄化形势非常严峻，同时城市化的进程依然快速，赡养老人的责任不能再交给农村家庭承担，所以必须加大力度推广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加大推行的力度并完善新农保制度有利于减轻农村家庭对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依赖，减少进一步老龄化对农村造成的负面冲击。

* 1. 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

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衔接好生育政策与新农保制度有助于缓解农村家庭养老压力，也有利于完善农村养老保险体系，提高我国农村养老保障水平。同时生育政策对新农保需求的影响研究不多，因此本文通过对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5和2018年数据的实证分析，以期补充这方面的研究，为今后学者的进一步探究提供参考。

研究全面“二孩”政策对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需求的影响对推进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和建设“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积极老龄化社会具有政策性意义。

* + 1. 现实意义

通过实证研究全面“二孩”政策对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需求的影响，得出该政策的净效应，有利于从宏观上调控两项政策的配合，无论是生育政策的激励方式还是新农保基金的收支情况，此外还有利于因地制宜地衔接两项政策，李真（2022）的实证分析表示，个体在新农保的影响下对生育儿子的意愿增加较少，表明新农保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养儿防老”观念，有利于三胎政策施行下，缓解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等问题。

* 1. 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第一章：绪论。包括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创新点和不足，文献综述。

第二章： 关键概念界定与理论框架。对影响家庭养老保险需求的因素做出判断和界定，对与家庭养老需求、生育政策相关的基础理论做阐述，对基于文献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得到的理论机制做全面的阐述。

第三章：全面“二孩”政策与新农保政策概述

第四章：机制分析。路线图以及要点分析和推导。

第五章：模型设定与实证分析。根据前述理论机制做出研究假设，根据文献研究选取变量，使用工具变量构建模型，阐述样本选取及其来源。根据前述已构建模型，使用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出关于研究假设的关键结论。

第六章：政策建议。根据实证分析结果，产出文章整体得到的对于研究问题的结论，即全面“二孩”政策对农村家庭新农保需求的影响机制，并从生育政策的角度理解新农保覆盖面较窄、农民参保积极性不高的问题，并提出两项政策如何改进和衔接的建议。

参考文献和致谢。

* 1. 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写作。

首先，通过国内外文献及智识数据库如知网、万方、webofscience、jstor等查阅相关研究文献、整理相关资料，对历史文献进行梳理，包括专著、期刊、学术论文等上关于“全面二孩”政策与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需求方面的文章，通过梳理，找到相关可能涉及的理论，

其次，将“二孩”政策作为工具变量建立模型模型，就“全面二孩”政策对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通过变量选取、模型构建、实证研究与检验来获知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情况，主要选择描述性分析法、PROBIT回归模型和工具变量法。

最后结合理论与实证分析，讨论全面“二孩”对因变量的政策效应，以及通过弱工具变量检验增加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 1. 创新点与不足
     1. 创新点

根据实证分析结果，产出文章整体得到的对于研究问题的结论，即全面“二孩”政策对农村家庭新农保需求的影响机制，并从生育政策的角度理解新农保覆盖面较窄、农民参保积极性不高的问题，并提出新农保如何覆盖非独生子女家庭的建议和看法。已有文献对生育政策与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需求影响的讨论仍不充分，本文对此进行了有益补充。

* + 1. 不足

目前已经出台了“三孩”政策，针对政策衔接问题的建议在时效性上存在不足；生命周期理论的前提是消费者理性，然而在中国农村家庭中除了数据上能显示的成本和收益以外，还有社会、心理等因素上的成本收益，因此该理论或许不能完全拟合本文的研究对象。

* 1. 国内外文献综述

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发现国内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生育政策对生育数量和质量的影响，以及养老模式这三个方面，而国外研究主要围绕生育激励、养老金制度展开。

* + 1. 国外文献综述

在“全面二孩”政策对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需求的影响研究下，外国相较中国最大的不同在城乡差距、生育政策沿革以及养老模式三个方面：中国作为振兴中的发展中国家，城乡及贫富差距较大，又开展过强制性的一胎政策，此外家庭为中国的最小单位，与国外社会养老或社区养老不同，养儿防老是中国约定俗成的养老模式，与此同时国外的城乡差距较小、以生育假和生育津贴的方式激励生育行为。因此国外的研究范围与中国有所重合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偏差，主要集中在女性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养老金制度以及生育和养老三个主题。

1. 生育政策

目前全球诸多国家的生育率呈现下降趋势，政策多以生育假和津贴等方式激励生育行为，而数据下降既是主观生育意愿，例如家庭及个体的主观意愿较低导致的（Mahmoudi，2017），也受客观条件，比如环境制约（Zakaria，2017）、政策力量（Fenge，2017）、文化塑造（Brinton，2016）等的影响，主要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经济因素以及女性个体四个方面相关。

其中正式制度主要包括生育政策以及社会保障制度，非正式制度主要有社会性别意识、宗教以及文化环境。经济因素包括社会发展水平和个人财富，最后女性个人角度包括职业发展（Aisenbrey，2009）以及受教育程度（Reshadat，2016）。

2.养老金制度

国外对养老金制度的讨论主要以政策制定者的角度进行，聚焦于养老金的管理监督，以及政策的评估、回顾上，以期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其中Weyland（2005）讨论了智利模式如何日益辐射至整个拉丁美洲；RING（2005）对英国的养老金制度进行了批判，矛头指向政府对“security”的理解； Borsch（2006）等人基于多个国家的人口经济数据建立了均衡模型，认为一旦快速老龄化，大量资本将流向世界其他地区，而封闭经济模型下的养老金改革无法使这一过程逆转。

少数学者以养老金制度需求者的角度进行研究，Banks等（2006）提到老年人的计算能力和认知水平对养老储蓄及财务投资的影响很大且对于个人而言越来越重要，Fornero等（2011）也认为金融素养越高，参与养老金计划的可能性就越大；Bodie（2009）回顾了生命周期理论下进行财务决策的文献，并概述了其对养老金制度设计的影响；有一部分学者特别关注少数人群，围绕性别、精神障碍（Mykletun等，2006）、残疾人（Karlsson等，2008）展开差异化研究。

3. 生育与养老

Galasso（2009）通过简单的两期世代交叠（OLG）模型表明在个人进入金融市场机会较少的国家，养老金的增加与生育率下降有关，而Stauvermann（2018）通过调查发现，有了子女津贴（child allowances），子女人数就会增加，养老金福利和预期寿命也会减少，与之相对的是，有了教育补贴（educational subsidies），子女人数减少，养恤金福利和预期寿命分别增加，也就是说单纯对子女进行补贴，会激励人们的生育行为而降低养老金福利水平，而提升子女的教育投资水平反而能够提高养老时的生活质量。此外一些学者从家庭的角度出发，认为户主和家庭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例如户主年龄、家庭规模、受教育程度以及宗教信仰等因素都会对家庭保险的需求和购买决策产生影响（Berekson，1972；Gandolfi，1996；Thankom，2012）。

* + 1. 国内文献综述

目前针对“全面二孩”政策，国内学者大都给予政策“预期”更多关注，即对政策出台后出生人口的预测，但是如何有效提高总和生育率，增强政策效果这一本质问题被学者们忽视。而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需求相关更多的是讨论运行成效和影响因素，许多学术研究关注了子女数量以及子女性别对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需求的影响，发现子女数量的增加会导致农村家庭养老保险支出减少，而这种减少在子女性别为男时更为显著。此外也有很多研究关注了计划生育政策和新农保政策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整合（董蕾，2013）。

1.新农保概述、运行成效与影响参保因素

（1）社会养老保险

郭磊、潘锦棠（2015）提出，强制性是社会养老保险的主要特征，因为养老保险制度是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实行并被监管（杜金霖、刘晓戈，2017），此举体现了政府意愿，由法律规定、政府执行参保者的参保与支付，同时政府管理养老保险基金，政府为了保证了被保险人的规模和养老保险的资金，强制规定农民只能选择参与养老保险。Enid（2009）认为，相较于城镇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更复杂且有待完善，当前制度设计仍然存在很多不合理之处。

此外，贾继开（2008）从再分配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养老保险，认为社会养老保险应当重新分配和储蓄建立起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为抵达年限的老人支付退休金费用。而刘芙、王韶春等（2009）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出发，认为实施社会养老保险有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李广艳（2010）也从这一角度提出观点，认为应当多元开拓资金筹集渠道，同时她也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角度指出，社会养老保险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生产力。总体来说社会养老保险的实施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保障老年人口、优化组合社会劳动力群体、改变传统的家庭养老和土地养老的观念、积极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薛惠元，2013）。

（2）新农保运行成效

新农保是社会养老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何种形式的社会制度下，农村人口作为社会阶层中劳动力付出最大的群体，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完全有理由获得来自国家相应的补贴和财政支持，Barr（2001）强调。

中国的农村人口长期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之外。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尤其如此，直到 2009 年政府试点新农村养老金计划时，他们才有权参加任何养老金计划。尽管政府从 2001 年开始推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低保），但覆盖率仅略有提高，从 2001 年的 0.4% 增加到 2015 年的 8.6%；此外，该计划并非针对老年人，而是针对穷人和弱势群体。

此外，一定程度上2009年的试点“新农保”减轻了家庭养老的压力，降低了老人对子女的经济依赖，淡化了“养儿防老”的观念，但是家庭养老本身具备的精神慰藉功能难以被社会养老替代，李光勇（2003）指出家庭养老模式兼具伦理与情感两方面的保障功能，伦理功能的发挥在农村家庭尤甚，这是社会化的养老保障制度无法替代的特征。因此应重视家庭养老模式，协调家庭与制度两种模式，使之互补，在家庭养老方面注重家庭资源因素，侧重家庭储蓄、子女数量等带来的保障功能。在制度养老方面则应注重制度化提供的因素，最终合力推动实现“老有所养”目标。

新农保的积极作用为学界的普遍共识，钟涨宝和李飞在2012年通过调查发现，农户普遍了解新农保政策，参保积极性较高，但也发现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新农保”试点过程中不难看出政策存在缺位、制度有效性不足的问题，未能解决逆向选择问题，健康水平低、中低收入水平、参保回报时间短的人大量被新农保吸引(穆怀中、闫琳琳，2012)；年轻农民的健康与收入水平在农村处于较高水平，其参保意愿相对偏低，而对于年纪较大的农民来说，捆绑缴费的参保方式也不能满足其参保意图(刘善槐等，2011)；新农保最低缴费档次格外“受宠”， (鲁欢，2012)；地方政府筹资难、基金管理难、参保意识维持难(范永茂，2011；王翠琴、薛惠元，2011)。

现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虽然有了一定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老龄化所带来的危害，但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譬如养老保险基金空账、覆盖面较窄、农民参保积极性不高等又是我们所无法忽视的，它们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成效。

（3）新农保参保的影响因素

国内在这方面研究的学者较多，2010-2011为研究成果发表的高峰年份，学者们将参保影响因素分为家庭、村镇、政策及政府作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家庭特征，通过调查数据发现：子女数量，尤其是男孩的数量，与农民参保社会养老保险的意愿呈现负相关关系(肖应钊等，2011；郝金磊、贾金荣，2011)。年龄与农民参保意愿正相关，16-39岁的年轻人参保的积极性比较低，而40—59岁的中老年人参保比例明显要高(苏东海、周庆，2010)。2010年张朝华在广东省茂名市的调查结果表明在愿意参保的农户中：农户选取个人缴费基数的档次与家庭规模、户主的年龄、户主的务农年限成反比而与户均耕地面积、户主的文化程度、农户家庭的纯收入与非农收入所占的比例呈正相关，同时，家庭年均纯收入高的农民参保意愿相对较强，以农业收入为来源的农民参保意愿低(黄阳涛等，2011)。蹇滨徽（2019）提出，家庭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程度越高，家庭成员参保养老保险比例越高。

其次是村镇特征，对于年龄较大的个体，村镇特征相比个体和家庭特征对参保率的影响更为显著（Chen， Xi et al. 2020），张川川和朱涵宇（2021）考察了同群效应在新农保参保中的作用，发现通过同村居民间的信息传递及内在的社会规范，村内居民参保比例上升10%，同一村镇内的个人参保概率显著增加4.24%。

最后是政策及政府作为：农民对新农保政策了解程度越高，参保意愿越强(郝金磊、贾金荣，2011)，养老金保障水平偏低会对农民参保产生不利影响(高君，2010)。而常芳等于2012年的调查同样显示农民对新农保政策及其实施细则等必要信息缺乏了解，并导致了农户参保率较低，因此政府应关注农村地区的金融知识和教育水平，并开展金融教育和培训计划，通过增加农村居民的参与和积极缴费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Xu et al， 2022）。

2. “二孩”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

作为保障国内人口与经济、资源承载能力平衡发展的重要举措，“二孩”政策现有相关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政策预期”是什么，以及达到“政策预期”与否的争论，囊括了大量的预测研究以及对经验数据的研究，从调查估计研究到政策效果实证研究，为及时优化生育政策提供了数据和理论上的依据。

从预期生育的目标家庭角度来看，翟振武等(2016)依据国家抽样调查数据测算结果进行分析，认为全国目标人群城乡合计910万人，约占符合条件人口的28%，同年靳永爱等利用2016年全国6省12市调查数据研究，发现目标人群中符合条件的占24.4%，略低于翟振武教授的测算结果，但两者的结论差异相对较小。而从年均新增出生人口数量的角度看，翟振武通过保守方案测算，得出的结果为年均增加160－470万新增出生人口，王金营等(2016)的研究认为“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实施期间国内年均新增出生人口数量会达到420万，他的结论亦与翟振武(2016)最保守方案测算的结果不谋而合。

由于对政策的预测角度、方法以及结论并不唯一，部分学者转换思路，从人口更替生育水平这一角度进行了研究。郭志刚(2015)研究认为即使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也难以重新攀升至更替生育水平，使人口达到稳定状态，穆光宗(2017)亦支持这一观点，与之相对的是乔晓春(2015)的观点，认为”二孩”政策将使生育水平回升至生育更替水平。

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106.9万对单独夫妇申请再生育，基本符合预期。预计2015年，受“单独两孩”政策影响，出生人口比2014年多100万左右。年新增100万新生儿，这个数字远低于之前许多专家的预期，政策效应不够理想(王金营，2016；王广州，2017)，即使“全面二孩”政策的调整能够对少子化以及老龄化有积极作用，然而在生育政策缺乏具体的鼓励措施时，政策调整带来的积极作用仍然不能达到理想状态(茆长宝，2018)，然而“单独两孩”政策遇冷了吗？

这个问题在2015年2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得到了答案：单独二孩政策与冷是一种误读，翟振武也表示这样表达不准确，“单独两孩”政策覆盖目标人群约1100万对夫妇，预计其中60%有生育两孩的意愿，生育时间分布约为4到5年，因此我们不能但从某一年的年度数据仓促得出结论，毕竟政策的滞后性可能使得每年将迎来100万—200万家庭生育第二孩，刘爽等(2015)也认为仅仅在“单独二孩”政策落地实施的一年后作出其“遇冷”的判断并不合理。而在政策实施的四年以后，学者们拥有了时间跨度更大搜集更为全面的数据，其中石人炳通过政策效果评估认为“二孩”政策有显著的效果，然而仅限于短期内，从中长期看，该项政策的调整效果仍然显得十分有限。同年张莹莹的研究也支持了石人炳的观点，认为全面“二孩”政策对中国妇女终身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是有条件的，而从目前的中国社会的经济特征来看，尚未达到这一条件。

3. 子女数量对家庭新农保需求的影响

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对增强我国家庭养老功能具有重要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有利于从改善家庭代际结构方面增强未来我国家庭养老的功能；第二，有利于 2040 年后我国大批独生子女父母进入高龄时有两个孙辈可协助照顾；第三，有利于规避与生育政策有关的独生子女不幸死亡和伤残给家庭养老带来的风险。

张朝华、丁士军（2010）从子女数量的角度出发，发现农村家庭内部的人口数量越少，则参加“新农保”的意愿越强，并且选择的缴费档次越高，他们指出，农民的子女越多，则越倾向于选择“养儿防老”，而子女较少的农民，则往往将养老计划寄希望于社会保险，而选取较高的缴费档次。赵昕、尹徐念（2016）则从孩子数的中介作用出发，分析了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后，民众对于二孩生育与否的影响因素。高传胜（2017）重新审视了政策改革后的家庭养老服务模式，提出全面“二孩”背景下，我国养老模式需要完善自身体系以适应新情境下的人口结构调整。

也有与张朝华等人（2010）持不同意见的学者，认为子女数量对老年人参保具有正向影响，尤其是有儿子的老年人更愿意参保，这或许是由于老人不愿意成为子女的负担，也可能是子女为帮助父母寻求更全面的养老保障而做出的参保行为（田雅莉，2022）。李真（2022）所做的回归分析显示养老保险会显著提高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且对于中等收入组的影响最大，对于农村低收入家庭来讲，“养儿防老”的观念更深。

* + 1. 文献综述评述

从对新农保政策的相关研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经历了从政策描述到政策效果评估，从浅显表面的描述到深入的使用数据研究的过程。然而还存在了一些不足，首先表现为没有使用规范的经济学方法、建立经济学模型进行研究。现今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新农保”可采取的模式、“新农保”的具体实施办法、取得的成效、基金的管理以及立法保障等。而关于生育政策的讨论，大多集中于政策预期，且关于其对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需求影响的讨论尚不充分。

此外，及时评价一项公共政策有助于后续政策研究制定，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政策更多的是进行描述、梳理，对其实施效果的评价存在一定不足。

2. 关键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1. 相关概念
      1. 全面“二孩”政策

生育政策是国家直接干预和调节影响人民生育行为的法令和措施的总和。

全面“二孩”政策指的是从2016年到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推行鼓励或强制一对夫妇最多生育两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它取代了之前在中国实施长达35年的一胎政策，此前，包括伊朗、新加坡和越南在内的几个国家都采用了”二孩”政策。

2021年6月1日，为提高生育意愿、改善人口结构，中国又放开了“三胎政策”，政策效果有待进一步检验。

* + 1. 新农保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是以保障农村居民年老时的基本生活为目的，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一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国家社会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2年后，中国开始探索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并进行了小规模的局部推行。

2009年9月，《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由国务院发布，并在当年启动了覆盖全国各地10％的县和市的新农保试点。随后，该政策进入了加速扩面和扩大试点阶段。

2012年，新农保在我国全面推广，社会养老保险已具一定规模。

2014年2月，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合并成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并开始对其进行统一管理。

2019年，全国有5.3亿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为88元每月每人。

* + 1. 代际交换

代际交换，Morgan（1983）认为是在家庭内部子代与父代之间代际资源的双向流动，也就是金钱等经济资源和劳务等非经济资源在代际之间的双向流动。

这项理论在中国也同样存在实践基础。一方面，在中国的传统孝文化中，子女向父辈提供代际支持，这项上游转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经济上的支持，第二日常生活中的照料，第三情感上的慰藉（穆光宗，1998）。另一方面，从父代流向子代（下游转移），父代倾向于通过储蓄和遗产赠送等方式将大量财富留给他们的孩子（Attanasio ，2017 ），而在一些传统重男轻女观念根深蒂固的农村地区，父母把子代婚姻当成自己的人生任务，从而承担很大一部分嫁娶花销，可以推断生育政策导致的生育行为使得父代向子代花费更多的钱，不光是代际交换甚至形成代际剥削。

* 1. 理论基础
     1. 资源约束与生命周期理论

在生育决策作出后，生育行为导致的各类经济变化需要及时应对，然而家庭中的现金流、住房面积，以及父母陪伴孩子的时间等一系列资源是有限的，面临资源约束时，家庭怎样在抚养子女和养老支出间调配，并在最终达到最优解，是每个农村二孩家庭需要解决的问题。

家庭生命周期指的是一个家庭诞生、发展直至死亡的运动过程，它反映了家庭从形成到解体呈循环运动的变化规律。一般把家庭生命周期划分为形成、扩展、稳定、收缩、空巢与解体6个阶段。6个阶段的起始与结束，一般以相应人口事件发生时丈夫(或妻子)的均值年龄或中值年龄来表示，各段的时间长度为结束与起始均值或中值年龄之差。

生命周期假设认为，当家庭结构发生变化时，家庭的资产配置决策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而受到政策影响的二孩家庭进入了家庭稳定期，根据储雨奇（2021）的研究不难发现：子女数量的增加整体上会提高家庭当期的人均消费水平，改变家庭消费结构，从而影响家庭内对社会养老保险的需求。

* + 1. 父母效用函数——非利他性与利他性模型

非利他性模型认为父母生育子女是为了于在晚年获得子女的馈赠，即“养儿”是为了“防老”，因此，父母不关心子女的消费水平，而只关心自身的消费水平，将子女视为资产（Cigno 1993；Rosati 1996）。

而在利他性模型下，父母并不将子女视为资产，而看成一种特殊的“消费品”，父母可以直接从子女身上获得效用。而父母从子女身上获取效用的方式不同又使得在利他性模型中，区分出了弱利他性模型与完全利他性模型，前者的效用来源是子女数量，并不包括子孙后代的效用（Eckstein and Wolpin 1985），因此被称为弱利他性；后者的效用来源不光有子女数量，子孙后代的效用水平也会对父母的效用产生影响（Zhang 1995），因此被称为完全利他性。

以上的此三者假设并未有绝对的正误之分，如何取舍这三种假设取决于所分析的经济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就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来看，中国尤其是农村地区适用于代际利他性模型。在中国农村地区，父母为了从子女身上获取效用，往往在前期为子女进行大量金钱与陪伴上的投入，因为子女未来的生活水平与父母未来能获得的效用水平直接挂钩，在传统农村地区“养儿防老”观念的加持下，一行为模式符合利他性模型，而且，，而农村地区仍然存在的彩礼等重男轻女的陋习，以及中国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对此项问题的家具，使得父母或家庭为了获得嫁娶时的议价资本，加大对子女后代的经济投入，使得利他性假设在中国农村地区得到贯彻。由此可以推断，由全面“二孩”政策导致的农村家庭中子女数量增加，尤其是男孩数量增加，会影响家庭的经济决策，从而影响对社会养老保险的需求。

* + 1. 工具变量理论

工具变量（英语：instrumental variable，简称“IV”），是经济学等相关学科中无法实现可控实验的时，用于估计模型因果关系的方法。在回归模型中，当解释变量与误差项存在相关性（内生性问题），使用工具变量法能够得到一致的估计量。根据定义，工具变量应该是一个不属于原解释方程并且与内生解释变量相关的变量。在线性模型中，一个有效的工具变量应该满足以下两点：第一，此变量和内生解释变量存在相关性；第二，此变量和误差项不相关，也就是说工具变量严格外生。

本文将全面“二孩”政策作为工具变量满足以上两项条件。

2. 全面“二孩”政策与新农保政策概述
   1. 全面“二孩”政策概述
      1. 机构组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简称国家人口计生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已撤销的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国务院组成部门。

机关曾于1960年代至70年代运作，当时因为政治运行不稳定，因而早期计生委效率不彰，中国人口仍持续飙升。1981年间被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并展开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甚至是国务院主要部门之一，生育率也快速下降。2003年改名国家人口计生委，2013年3月，国家人口计生委大规模改组。其拟定计划生育政策、负责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的职责与原卫生部的职能，划入新成立的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其拟订人口发展战略、规划及人口政策职责划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但由于高层放宽单独二孩政策后，发现计生委多年来均误判生育率，实际上糟糕的生育形势已经过低并持续过久，人口控制政策需要立即结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遂于2018年被直接取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标准简称国家卫生计生委，亦简称国家卫计委，是已撤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主管卫生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组成部门。2013年重组政府部门时职能变更，由卫生部和国家计生委合并而来，但后续由于查出生育率异常，控制动机不再和人口危机等因素，计生部门再度于2018年被重组撤裁，剩余下来的原卫生部的相关单位经整合后，改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 + 1. 全面“二孩”政策概述

自1979年起中国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规定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这项政策的迅速实施导致了生育水平不断下降，并且通过随后二十年的政策执行，到1999年，迅速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由于每年具体的出生人口数很难精确统计，因此本文选择的数据指标是常住人口出生人数以及常住人口出生率。也有一些统计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年末总人口计算出年平均人口，从而根据出生率计算年度出生人口。可以从图3.1看出我国常住人口出生率从1979年的17.82‰降低至1999年的14.64‰。

图3.1 1979-2004年中国常住人口出生人数（万人）及出生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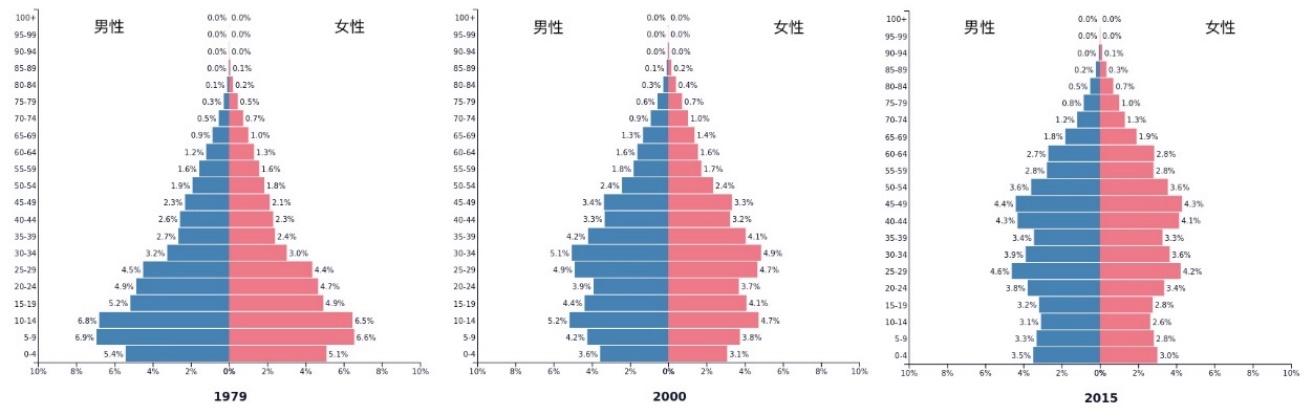
而人口金字塔形状也逐渐从金字塔型趋于纺锤形，1979年，年轻人口位于金字塔底部，二十多岁的人口是六十多岁人口的三倍，此时的人口结构有助于中国的经济转型，然而当我们走到2015年，二十多岁年轻人的数量几乎与六十多岁人口的数量持平。

图3.2 1979、2000、2015年中国分性别人口金字塔

面对少子化困境和老龄化社会，中国政府于2015年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正式推出“两孩”政策，然而并未出现预期的生育潮，于是在2021年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宣布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将“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作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一项重要举措。完善生育保险制度立法不仅有助于保障女性就业、健康权益，促进就业性别平等和工作家庭平衡，而且对推动“三孩”生育政策有效落地、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 + 1.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纵横向分析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目标主要有两项，首先是面向全社会的政策导向作用，其次是针对目标家庭具体的生育行为指导。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缓解少子化与老龄化，然而由于其实施显著晚于人口老龄化，在二十一世纪初显露出的老龄人口问题并未得到重视，再加上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城市化进程的步伐加快，此外由政府主导实施的公共政策往往具有滞后性，在”均衡“与”不均衡“间往复循环，而全面”二孩“政策同样如此，当政策发生变化时政策目标不能马上反应，即出现滞后性，且该项政策考虑到先前的独生子女优惠，并未出台生育津贴和均衡产假等配套措施，有效性上打了折扣，因此当我们从事后的眼光看待2015年的政策实施时，会发现政策时滞已然使得老龄人口以及其衍生的问题难有转圜的余地。劳动人口的减少给经济带来进一步的压力，我们也能看见随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实际已经放缓。

图 3.3 2000-2021年中国GDP增长率（%）

横向来看中国与其他国家最大的不同在于，在一开始实行了计划生育（birth control）而非激励性的政策行为，这一政策很大程度挫伤了民众心理，因此不同于三胎政策出台时配套各类假期和措施，“二孩”政策所做的仅仅是宣布放开对只能生育一个的限制，解放以及实现民众对生育两个及以上后代的需求，并未像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及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大部分发达国家一样，通过发放津贴、生育假和教育补助等来激励女性生育，反而进一步挤压了女性的工作机会和事业生长空间。例如2006 年起生效的魁北克父母保险计划 (QPIP) 是工人更好地协调工作和家庭责任的有效手段。它旨在支持新生儿或新收养孩子的父母，鼓励他们的生育愿望，并支持他们将更多时间花在孩子身上。QPIP 的设立是向所有正在休生育相关假期的合格工人（领薪和/或个体经营者）支付福利。

“二孩”政策除了作为对全体适龄或在未来即将适龄生育的个人的生育利好信号以外，具体针对的是已经生育过一个子女，且存在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愿望，但苦于政策限制无法实现的单孩家庭与失独家庭。

这类生育动机（即生育不止一个子女）主要存在于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需要“追男宝”保持香火传承的农村家庭，或是经济基础和社会压力较小、具备良好剩余环境的小康以上家庭。本文以研究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需求为主，也就是提到的前一种家庭，具体来说有以下几项特征：（1）男方家庭位于农村；（2）重男轻女思想严重；（3）作为生育承载方的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于大学，仅有高中或专科学历，性教育和生殖教育不足而容易受到外界影响，顺应传统封建糟粕文化进行生育甚至多次生育。

* 1. 农村家庭养老保险概述
     1. 政策背景

人口老龄化作为人口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发生的社会现象,已经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陆续出现。它的基本检测标准就是,一个国家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7%。我国达到这一标准是在1999年。自此之后,人口老龄化以令人震惊的速度不断加深。我国人口老龄化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自8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基本国策，农村家庭规模变小且形成扭曲的“421”模式。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促使居民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将很快成为中国直接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邓小平同志曾说：“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虽然城市人口逐渐赶上农村人口数量，逐渐持平，但这主要源于城市化速度加快，城乡剪刀差加大，可以说城市人口的赶超速度越快，被遗留在农村的老龄人口越多，农村的老龄化越严重，养老问题越严峻。

* + 1. 具体实施

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为逐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2009年9月1日，国务院决定新农保首批试点规模为全国10%左右的县（市、区、旗）为支持各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的开展，中央财政下达2009年新农保试点首批补助9.5亿元。

2020年之前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同时明确新农保试点的基本原则是“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可持续”。

政策明确，新农保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构成。参加新农保的农村居民应当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缴费标准目前设为每年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5个档次，地方可以根据当地村民的实际情况增设缴费档次，多缴多补。

在2010年新农保试点刚刚结束不久，全面铺开之际，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不断提升，城镇覆盖率达到达到84.7%，其中每人月均退休金为1527元；而农村覆盖率也达到34.6%，然而农民们每月能领取到的养老金仅有74元，这个数字甚至不超过城市老年人所能领取的5%，考虑到城镇中享受养老金待遇者中近3/4是退、离休职工，当他们在国家财政的支持下养老时，与之对应的农村老年人却仍然忙于地里的生计，除了微薄的养老金，就只有倚赖于子女，这既是对老人的年龄歧视，也是对农村人口的不公。

在如此背景下，我国应当继续探索养老分配机制，如何从“养儿防老”到“制度养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以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养老服务、健康支撑体系为重点，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化改革、综合施策，加大制度创新、政策供给、财政投入力度，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在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上不断取得新进展，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1. 全面“二孩”政策对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需求的影响机制分析
   1. 全面“二孩”政策通过子女数量影响家庭养老模式与经济决策

根据石人炳（2018）的研究，全面“二孩”政策对二孩出生数量的增加以及二孩生育水平的提高都产生了明显效果，而且这是在不考虑生育政策效果延迟得到的结果，因此可以得出全面“二孩”政策对生育行为起到促进作用这一结论，且其促进作用甚至比石人炳等人通过公开数据计算得出的作用更强。

此外，石人炳（2015）对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的中部四个省份的生育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单独“二孩”政策的出台使得目标家庭之中男孩的数量远大于女孩，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更为严重，这一后果可能由于该项政策鼓励人们通过多进行生育的方式获得更多男性后代，且并未考虑到出台更合理的规定制止非法的胎儿性别鉴定。

家庭内的子女数量包括总子女数量以及男孩数量。

生育行为改变了家庭中的子女数量，从1上升为2。而对生育行为管控的放开，使得家庭结构从“四二一”走向“四二二”，且二孩性别比扩大，男孩数量远大于女孩。此外孩子来临，家庭中加入了教养孩子、经济和家务工作，同时与囊括父辈在内的大家庭重新组合关系，需要养育下一代的同时承担照顾上一代的责任，目标家庭进入了新的生命周期。

* 1. 养老模式与经济决策影响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需求
     1. 中国农村家庭养老模式的转变——向“养儿防老”回落

封闭的农业经济社会中，医疗技术并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也有待提高，生育的子女后代越多，作为家庭中的父代老去时，能够赡养自己的人也就越多，生活就越有保障，养老出于人们对老年生存的渴望，在中国的祖宗礼法体制下被不断认可加强，并且在家族制和宗法组织下被不断维护。

此时老人是家族的重心，家庭伦理亦不断强调尊老爱幼（费孝通，1985），然而由于中国的男权社会性质，养老责任并不由全体后代承担，而是被限定在了父系家族体系下，因此养儿防老中的“儿”，往往指的是男性后代，而和女性后代几乎没有关系。

生育的后代越多，生育男性后代的概率就越大，为了防范出现无人养老的情形，没有剩余约束的环境下农村家庭采取的策略就是多生孩子，而且这一行为也得到了生产方式这一角度的支撑：传统的农业行业中男性劳动力比女性更占优势，因此从生产和宗法角度而言，传统的农村家庭都倾向于生育男性后代来承担养老责任，“养儿防老”这一养老模式根深蒂固。

而进入二十一世纪，老龄化已然到来，尽管那时已经产生了对空巢老人的社会关注，但农村家庭的养老问题并未真正进入大众视野，再加上全国上下都有农民工进城的热潮，在启动新农保试点以前，人们对养老的普遍认知还停留在“养儿防老”以及依赖老人自身的积蓄养老，而此时国外的养老金已经日趋福利方向进行讨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尤其是自2009年启动全国性的新农保试点后，社会养老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也成为政策施为的主要对象。

然而经过单独“二孩”政策与全面“二孩”政策，家庭子女数量增多，尤其是男孩数量，且家庭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养老模式重新向“养儿防老”的方向回落，或者说基于“养儿防老”的养老动机，为了能在未来获得孩子的回报，当下的父母可能会为此增加生育数量。

子女数量，尤其是男孩数量增加能够提高家庭中父代与子代之间的代际转移支付，通过子代增加支付对父代晚年的赡养费用，来提高其养老保障水平（汪伟，2017），同时也满足了养儿防老的社会心理需求，从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向养儿防老模式的倾斜，再加上对于农村低收入家庭来讲，“养儿防老”的观念更深（李真，2022），由此看来，“二胎政策”不可避免地对农村家庭中的社会养老保险需求产生冲击。

* + 1. 经济决策影响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需求

人是实施消费行为的主体，全面“二孩”政策的开展实施会影响家庭内部现期消费水平、资源配置与经济决策。人口结构的改变首先会影响家庭生命周期资源配置，进而影响社会养老保险支出（Samuelson，1958），从微观层面看，孩子本身作为当下的“消费品”和未来的养老资源，会使得家庭预期未来有更高的育儿支出，无论是文化教育支出（人力资本投入），还是由于孩子数量的增多导致的家庭住房需求上升，同时新农保加入的条件中一直包括“家庭捆绑制”，即对于年满60周岁的老人，领取基础养老金的资格与其子女是否参保相挂钩，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挤出效应，抑制农村家庭的参保需求，使得家庭内考量支出社会养老保险时，需要连带年迈父母的那一份一起缴纳，使得家庭倾向于增加现期消费，这些都以减少其他方面支出为代价，因此，当生育行为确定时，“二孩”政策很大程度会抑制家庭社会养老保险的支出。

国内基于生育政策视角对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需求影响的研究还较少，基于此，本文希望探究全面“二孩”政策冲击下、子女数量等变化对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需求的影响，并进一步发掘农村地区生育与养老政策更好协调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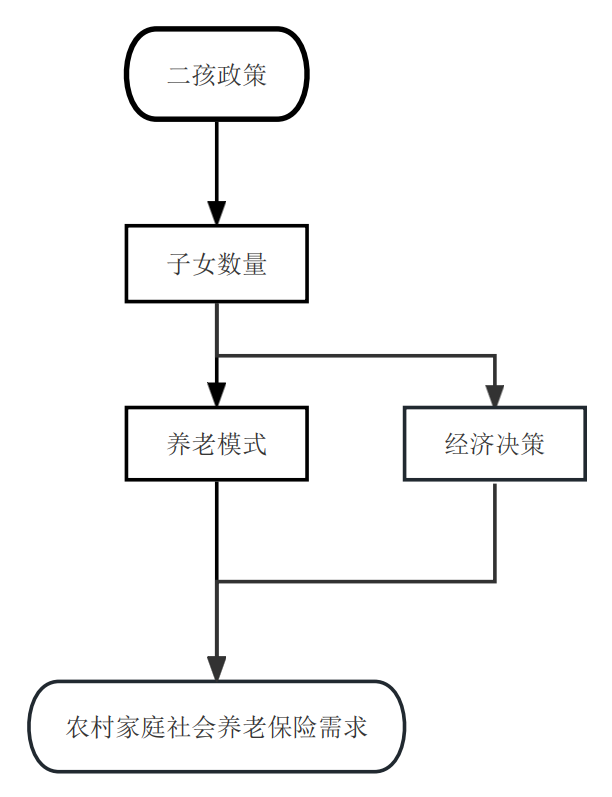
* 1. 影响机制分析路线图

图4.1 全面“二孩”政策对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需求的影响机制分析路线图

全面“二孩”政策通过如上路径影响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需求。

2. 实证研究设计与结果分析
   1. 实证研究设计
      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旨在通过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为学术研究和公共政策分析提供数据基础。

由于本文所研究的全面“二孩”政策具有一定的政策时滞性，因此选取了此项政策实施前后的2016年及2018年两期数据。且样本覆盖了 25 个省市，因此本文同时进行了地域分析，观测全面“二孩”政策对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需求的影响在中部、东部和西部的相同点和差异。

为了保证研究的可信度和可行性，本文对数据进行了清洗合并，此外，基于 CFPS 的个体特征变量及家庭变量，对数据进行了进一步处理，(1）去除了位于城市的数据；（2）去除了少数民族以及位于少数民族聚集地的家庭数据；（3）去除家庭属于“一孩为女孩，可生育第二个孩子”地 区（村/社区）的数据；（4）去除家庭属于“在政策实施前一个家庭即可生育两个孩子”地区（村/社区）的数据（汪伟，2020）；（5）去除妇女年龄超过 55 岁（即最高生育年龄）的家庭的数据。

通过上述处理，可以保证最终得到的样本都是位于农村且全面“二孩”政策适用的地区，最终筛选出2942个样本。

* + 1. 变量选取

本文在研究全面“二孩”政策对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需求时，把是否参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nrps）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家庭内的子女数量（child）作为回归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借用已有的研究引入第一孩性别（b1gender）、房屋成本（household）、父母学历水平（edu1）、商业养老保险支出（ci）以及对政府态度（policytrust）作为控制变量.

父母学历水平是以双方中最高学历定义的（文盲/半文盲=1；小学=2；初中=3；高中/中专/职高=4；大专=5；本科=6；硕士=7；博士=8）（汪伟，2020），以全面“二孩”政策（policy）作为工具变量。

表5.1 变量名称与定义

|  |  |  |  |
| --- | --- | --- | --- |
| 类型 | 变量 | 名称 | 指标 |
| 被解释变量 | 新农保需求 | nrps | 是否参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
| 核心变量 | 子女数量 | child | 家庭中的子女数量 |
| 控制变量 | 第一孩性别 | b1gender | 家庭中生育第一孩的性别 |
| 房屋成本 | household | 一年中的住房成本 |
| 父母学历水平 | edu1 | 父母双方中的最高学历 |
| 商业养老保险支出 | ci | 一年中商业养老保险支出 |
| 对政府态度 | policytrust | 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 |
| 工具变量 | 全面“二孩”政策 | policy | / |

* + 1. 模型构建

首先，对全面“二孩”政策影响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需求的路径进行描述性分析，利用 CFPS 数据探讨其背后原因。 其次，当农村家庭是否参保作为被解释变量，是离散型变量时，研究通常需要用离散型回归来解决问题，而不能用普通线性回归来进行分析。

参考历史文献研究结果，建立PROBIT模型如下：

nrps= β0 + β1child + β2 b1gender + β3 household + β4 edu1 + β5 ci +β6 policytrust + ε

随后运用工具变量证明“二孩”政策不通过子女特征以外的途径影响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需求。并最后通过AR和Wald进行弱工具变量检验。

* 1. 实证结果与分析
     1. 描述性统计

表5.2样本主要变量的分布情况

|  |  |  |  |  |  |
| --- | --- | --- | --- | --- | --- |
| Variable | Obs | Mean | Std. Dev. | Min | Max |
| nrps | 2942 | .357 | .479 | 0 | 1 |
| child | 2942 | 2.096 | 1.326 | 0 | 8 |
| policy | 2942 | .487 | .5 | 0 | 1 |
| edu | 2942 | 2.08 | 1.113 | 1 | 8 |
| household | 2942 | 74.858 | 949.108 | 0 | 40000 |
| policytrust | 2942 | 5.193 | 2.949 | 0 | 10 |
| ci | 2942 | .012 | .108 | 0 | 1 |

（续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Variable | Obs | Mean | Std. Dev. | Min | Max |
| b1gender | 2942 | .577 | .494 | 0 | 1 |
| midd | 2942 | .346 | .476 | 0 | 1 |
| west | 2942 | .218 | .413 | 0 | 1 |

* + 1. 概率单元回归结果确定因果关系

为初步验证子女数量（child）和农村家庭是否参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nrps）的相关关系，本文首先使用PROBIT模型、和聚类调整回归，报告的结果如下表 6-2所示。

表5.3 PROBIT模型及回归结果（含聚类调整）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2） | （3） | （4） | (5) |
| VARIABLES | nrps | nrps | nrps | nrps | nrps |
|  |  |  |  |  |  |
| child | -0.0771\*\*\* | -0.0767\*\*\* | -0.0774\*\*\* | -0.0794\*\*\* | -0.0794\*\*\* |
|  | -0.0184 | -0.0184 | -0.0184 | -0.0199 | -0.0196 |
| b1gender |  | -0.0337 | -0.0365 | -0.046 | -0.046 |
|  |  | -0.0477 | -0.0478 | -0.0486 | -0.0487 |
| household | |  | -0.71 | -1.032 | -1.032 |
|  |  |  | -0.811 | -0.984 | -0.911 |
| edu1 |  |  |  | -0.722 | -0.722 |
|  |  |  |  | -2.32 | -2.296 |
| ci |  |  |  | 0.0557 | 0.0557 |
|  |  |  |  | -0.216 | -0.218 |
| policytrust | |  |  | -0.0215\*\*\* | -0.0215\*\*\* |
|  |  |  |  | -0.00812 | -0.00806 |
| Constant | -0.207\*\*\* | -0.189\*\*\* | -0.181\*\*\* | -0.0408 | -0.0408 |
|  | -0.0443 | -0.0514 | -0.0521 | -0.0936 | -0.0939 |

注：\*\*\* p<0.01, \*\* p<0.05, \*p<0.1

可以从回归结果（1）看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在99%的信度区间下呈现负相关关系，回归结果（2）表明，第一孩性别如为男，农村家庭会减少对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需求，然而这项结论的p值不显著，判定结果很弱，同样房屋成本、家庭中父母最高教育水平以及是否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对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需求的影响呈现反方向的，因此当生育二孩之后，家庭育儿消费支出增多， 那么在收入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时，父母可能会减少享乐型消费，也就是说除了住房等刚性消费以外，减少其他方面的现期消费，尤其是养老金需要极长的时间跨度才能领取，然而这些影响都不显著。

最后根据回归结果（4）以及（5）可以看出，家庭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更高，家庭越会选择参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且二者在99%的水平下显著相关。

本文还进行了地域分析，分别对东部、中部以及西部进行了PROBIT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表5.4 地域PROBIT回归结果（含聚类调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ast | | midd | | west | |
|  | （6） | （7） | （8） | （9） | （10） | （11） |
| VARIABLES | nrps | nrps | nrps | nrps | nrps | nrps |
| child | -0.0999\*\*\* | -0.0999\*\*\* | -0.045 | -0.045 | -0.104\*\*\* | -0.104\*\* |
|  | -0.0336 | -0.0338 | -0.0332 | -0.0327 | -0.0396 | -0.0406 |
| b1gender | 0.00917 | 0.00917 | -0.111 | -0.111 | -0.0429 | -0.0429 |
|  | -0.077 | -0.0771 | -0.0819 | -0.082 | -0.103 | -0.103 |
| household | -2.966\* | -2.966\* | -1.136 | -1.136 | -0.291 | -0.291 |
|  | -1.68 | -1.662 | -1.736 | -1.609 | -0.48 | -0.185 |
| edu1 | -4.358 | -4.358 | 9.995\*\*\* | 9.995\*\*\* | -5.752 | -5.752 |
|  | -3.796 | -3.571 | -3.814 | -3.864 | -5.017 | -5.053 |
| ci | 0.489 | 0.489 | -0.223 | -0.223 | -0.0871 | -0.0871 |
|  | -0.349 | -0.364 | -0.317 | -0.317 | -0.573 | -0.575 |
| policytrust | 0.0321\*\* | 0.0321\*\* | 0.0374\*\*\* | 0.0374\*\*\* | 0.025 | 0.025 |
|  | -0.0129 | -0.0127 | -0.0135 | -0.0137 | -0.0174 | -0.0172 |
| Constant | -0.101 | -0.101 | -0.15 | -0.15 | 0.13 | 0.13 |
|  | -0.154 | -0.152 | -0.156 | -0.159 | -0.19 | -0.195 |

注：\*\*\* p<0.01, \*\* p<0.05, \*p<0.1

通过分地域的回归发现发现无论是否经过聚类调整，东部和西部地区中子女数量对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需求的影响呈现反方向的，且结果显著，然而中部地区并不显著。

此外单就东部地区来看，房屋成本对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需求的影响呈现反方向的，这符合我们一开始的影响机制推断，即在生育后家庭进入新的生命周期，住房成本一定程度上会挤压新农保需求和支出。而中部地区中父母双方中的最高学历水平越高，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需求越能得到满足，这符合我们一开始的假设，认为家庭教育水平能够推进家庭的养老模式丰富，并向社会养老方向过渡。而东部和中部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对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需求的影响同样呈现反方向的，这与我们不分地域进行回归时所得到的结论一致。

* + 1. 工具变量法

在使用工具变量(IV)模型时， 需要证明工具变量(Z)与自变量(X1)之间具有可观性和可分离性。可观性指工具变量(Z)与因变量(Y)之间存在关系， 可分离性指工具变量(Z)与自变量(X1)之间不存在关系。这两个条件是使用工具变量模型的关键。

具体来看，本文使用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需求，自变量为 子女数量，工具变量为 全面“二孩”政策 ，根据前文分析的影响机制，生育政策只对生育行为有影响，而生育行为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需求，根据PROBIT回归结果表示，全面“二孩”政策对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需求，因此同时满足了可观性与可分离性。可以使用工具变量法。

如下是普通回归、含标准误回归以及Neway两步回归下含聚类调整与不含的六项回归结果。同样可以得出子女数量与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需求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表6-4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含聚类调整）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  | (13) |  | (14) |
| VARIABLES | nrps | child | nrps | child | nrps child |
|  |  |  |  |  |  |
| child | -0.784\*\*\* |  | -0.784\*\*\* |  | -1.999\* |
|  | -0.057 |  | -0.0658 |  | -1.192 |
| b1gender | -0.0385 | -0.0342 | -0.0385 | -0.0342 | -0.0982 |
|  | -0.0403 | -0.0462 | -0.0405 | -0.0463 | -0.106 |
| household | -0.232 | 0.202 | -0.232 | 0.202 | -0.591 |
|  | -0.47 | -0.236 | -0.416 | -0.127 | -1.092 |
| edu1 | -30.62\*\*\* | -40.40\*\*\* | -30.62\*\*\* | -40.40\*\*\* | -78.09 |
|  | -3.308 | -2.057 | -3.336 | -2.242 | -48.26 |
| ci | -0.157 | -0.234 | -0.157 | -0.234 | -0.4 |
|  | -0.18 | -0.208 | -0.155 | -0.148 | -0.535 |
| policytrust | 0.00433 | 0.0168\*\* | 0.00433 | 0.0168\*\* | 0.011 |
|  | -0.0087 | -0.00766 | -0.00874 | -0.00807 | -0.0263 |
| policy |  | 0.0832\* |  | 0.0832\* |  |
|  |  | -0.0452 |  | -0.045 |  |
| Constant | 2.136\*\*\* | 2.827\*\*\* | 2.136\*\*\* | 2.827\*\*\* | 5.449 |
|  | -0.226 | -0.0739 | -0.246 | -0.0794 | -3.414 |
|  |  |  |  |  |  |
| Observations | 2,942 | 2,942 | 2,942 | 2,942 | 2,942 |

注：\*\*\* p<0.01, \*\* p<0.05, \*p<0.1

* + 1. 弱工具变量检验

最后根据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进行了弱工具变量检验，AR与Wald检验均表明在95%的置信区间，上述回归结果成立。

表6-5 弱工具变量检验

|  |  |  |  |  |
| --- | --- | --- | --- | --- |
| Test | Statistic | p-value | Conf. level | Conf. Set |
| AR | CHI2(1)=11.68 | 0.0006 | 95% | [ ... ,-.744015] |
| Wald | CHI2(1)=2.47 | 0.1162 | 95% | [-4.52154, .498259] |

2. 结论与建议
   1. 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首先，“全面二孩”政策下，子女数量显著负向影响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需求，同之前假设猜想一致。代际交换利他模型可以支撑此条结论，一方面，子女数量愈多，父母对其经济投入也就愈多，所期待在子女身上得到的效用也就愈多，养老模式进一步向“养儿防老”迁移，从而降低了对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的期待，需求减少；另一方面，整体资源投入是有限度的，父母将资源更多投入到子女身上时，在其他方面投入必然减少，经济状况不允许的情况下，本来有意愿购买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的居民会慎重考虑其未来效用，几番抉择后可能认为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并不会带来收益，从而不选择参保。

其次，学历水平正向调节了子女数量与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需求之间的关系，换而言之，学历水平越高的父母，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需求越高。学历水平高意味着其观念以及决策能力更高于平均水平，高学历者更能理解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为何优于“养儿防老”，其参保率会更高。

此外，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正向影响居民是否参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居民越信任村干部，就更愿意去了解村干部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宣传，从而做出更利于自己的养老决策，而不是单纯认为保险毫无用处，村干部所做工作只是为了搜刮民脂民膏。

本文基于全面“二孩”政策如何影响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需求得出的创新理论对于现实的指导意义是重大的。“全面二孩”政策下，如何削弱子女数量对参保率的负向影响是值得考虑的，本研究的相关给实践指明了一些方向。

尽管本文对全面“二孩”政策如何影响居民参与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进行研究得出了诸多结论，也存在一些不足。其一，影响参保率的因素太多，本研究考虑的并不全面，例如家庭年收入理论上会显著影响参保率，未来研究可以考虑选取更多变量，构建更为全面的模型。其二，尽管子女数量显著影响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需求，但其中机制为何，本研究虽然提出相关见解，但不见得全面，例如父母对于子女的投入并不仅仅是资金，还有情感，代际交换并不能充分解释养老模式的倾向，未来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补充与优化。

* 1. 建议

针对全面“二孩”政策对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需求的各方面影响，汲取先前的经验，以下是一些具体的研究和应对建议：

* + 1. 政府完善新农保体系，进行农村家庭经济教育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将带来更多的家庭需要社会养老保险的情况。因此，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家庭结构的变化。农村家庭多为传统意义上的大家庭，随着“二孩”政策的实施，有些家庭可能需要承担更多的养育和照顾责任，这对于家庭经济和养老保险都是一个挑战。因此，建议在政策实施前后，开展家庭结构变化的调查研究，以更好地掌握农村家庭的实际情况。

当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尚不完善，覆盖面相对较窄。针对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建议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提高保险覆盖面，尤其是针对农村家庭中的儿童和老年人，加强社会养老保险的保障力度。同时，鼓励农村家庭加强自身储蓄和投资，提高家庭的风险承受能力。此外也要加强社会保险宣传和教育，针对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需要加强社会保险宣传和教育，特别是对于农村家庭中的儿童和老年人。转变农村居民传统的养儿防老的养老模式，改善性别观念。同时，农村居民对于社会保险的认知度较低，对于保险产品和保障范围也不够清楚，因此需要加强对于社会保险的宣传和教育。同时，鼓励农村居民自觉参加社会保险，提高保险意识和保险责任意识。

* + 1. 完善政策衔接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需要政策衔接的配套措施。因此，建议完善政策衔接机制，特别是社会养老保险和生育政策之间的衔接，更好地保障农村家庭社会养老。同时，需要将社会养老保险和其他社会保险政策进行有机衔接，形成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保险保障的全面性和连续性。还应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参与，在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参与非常重要。政府可以通过补贴和优惠政策，鼓励农村居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提高保险覆盖率；同时，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到养老保险领域，完善养老保险市场。

此外，还可以通过激励机制，鼓励社会保险机构创新服务模式，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更好地满足农村家庭的保险需求。最后通过加强监管和风险防范，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将带来一定的风险和挑战，因此需要加强监管和风险防范。一方面，需要加强对于社会保险机构的监管力度，防范机构运营风险和资金安全风险；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对于保险产品和服务的监管，提高保险市场的透明度和公正性，保护农村居民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全面“二孩”政策对于农村家庭社会养老保险需求将产生广泛的影响。针对这一情况，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家庭结构变化，完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加强社会保险宣传和教育，完善全面“二孩“政策与新农保政策之间的衔接，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参与，此外也应该加强家庭的经济教育与性别平等意识教育，破除封建的重男轻女思想，引导养老模式从“养儿防老”向“制度养老”转变，只有全面考虑各种因素，才能更好地满足农村家庭的养老需求。

参考文献

[1]田雅莉，姜捷.老年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7数据的实证分析[J].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6(01):50-56.DOI:10.16515/j.cnki.32-1745/c.2022.01.008.

[2]李真.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否会挤占农村居民生育意愿——基于CGSS数据库实证分析[J].华北金融，2022(03):10-21.

[3]鲁浚豪. 新农保对农村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研究[D].暨南大学，2021.

[4]郭蜜蜜，邱佳炜.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J].现代营销(学苑版)，2021(05):39-41.DOI:10.19932/j.cnki.22-1256/F.2021.05.039.

[5]滕晓慧. 新农保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D].山东大学，2021.

[6]张雷，顾天竹.子女增加会减少父母对商业保险的需求吗?——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分析[J].南方金融，2020(05):63-72.

[7]巫聪慧. 人口结构对中老年家庭人寿保险需求的影响研究[D].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20.

[8]蹇滨徽，徐婷婷.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养老保险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J].金融发展研究，2019(06):32-39.

[9]秦玺真. 全面二胎背景下推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策略研究[D].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018.

[10]郭柱江.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生育率的影响研究[D].云南大学，2018.

[11]邢聪聪. “新农保”对自下而上的代际转移支付的影响研究[D].武汉大学，2017.

[12]赵昕，尹徐念.全面二胎政策背景下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机制——基于家庭孩子数中介作用的实证分析[J].生产力研究，2016(11):115-119.

[13]王剑雄. 基于生育政策演变的全面”二孩”政策人口效应分析[D].云南大学，2016.

[14]桂世勋.全面两孩政策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J].人口研究，2016，40(04):60-65.

[15]刘华，陆炳静，王琳，朱晶.计划生育政策对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影响——基于DID方法的实证检验[J].中国农村经济，2016(04):70-80.

[16]陈华帅，曾毅.“新农保”使谁受益:老人还是子女?[J].经济研究，2013，48(08):55-67+160.

[17]刘冰，赵子乐，曾福生.“新农保”有利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吗?——一个经济学解释[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2(01):118-125.

[18]肖应钊，李登旺，李茜茜，耿焕瑞，厉昌习.农村居民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山东省试点为例[J].社会保障研究，2011(05):40-50.

[19]王翠琴，薛惠元.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相关制度衔接问题初探[J].经济体制改革，2011(04):81-85.

[20]郝金磊，贾金荣.西部地区农民新农保参与意愿研究[J].西北人口，2011，32(02):107-110+118.

[21]张朝华.农户参加新农保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广东珠海斗门、茂名茂南的调查[J].农业技术经济，2010(06):4-10.

[22]沈苏燕，李放，谢勇.中青年农民养老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南京五县区的调查数据[J].农业经济问题，2009，31(11):84-89+111-112.

[23]刘爱玉.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变迁及其影响[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05):69-75.

[24]彭浩然，申曙光.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与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与中国经验[J].世界经济，2007(10):67-75.

[25]谢永飞，刘衍军.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及其变迁——以广州市流动人口为例[J].人口与经济，2007(01):54-57+53.

[26]Cigno Alessandro.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without Altruism: Family，Market and State[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3(9):505-518.

[27]Rosati Furio Camillo. Social Security in a Non-altruistic Model with Uncertainty and Endogenous Fertility[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6(60):283-294.

[28]Eckstein Z， Wolpin KI. Endogenous Fertility and Optimal Population Size[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85(27):93-106.

[29] Schatz， Enid J. “Reframing Vulnerability: Mozambican Refugees’ Access to State-Funded Pensions in Rural South Africa.”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 24 (2009): 241-258.

[30] Xu， Shulin et al. “Effect of household's financial literacy on pension decision making: evidence from China's new rural pension program.” Kybernetes (2022): n. pag.

[31] Yongli， Wa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Will and Behaviors of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the New Rural Social Pension Program: A Case Study of Fujian.” Finance & Trade Economics (2012): n. pag.

[32] Rudolph， Jennifer， and Michael Szonyi， editors. The China Questions: Critical Insights into a Rising Pow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JSTOR.

[33] McDonald， Peter. “An Assessment of Policies That Support Having Childre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quity， Efficiency and Efficacy.” Vienna Yearbook of Population Research， vol. 4， 2006， pp. 213–34. JSTOR.

[34] Albert， Isabelle， and Dieter Ferring， editors.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Perspectives in Family and Society. 1st ed.， Bristol University Press， 2013. JSTOR.

[35] You， Jing， and Miguel Niño-Zarazúa. “The Intergenerational Impact of China’s New Rural Pension Schem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45， 2019， pp. 47–95. JSTOR.

[36] Chen， Xi et al. “Leaving Money on the Table? Suboptimal Enrollment in the New Social Pension Program in China.”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ageing vol. 15 (2020).

致 谢

特别感谢xxx导师对我的悉心指导和支持，也感谢在外婆重病期间陪伴我身边支持我的家人和朋友们。

同时要感谢在xxx相遇的每一位老师和同学，课堂之上、小组之间我学到了很多，漫步在xxx，惠园务实而自由的精神始终浸润着我。

最后，衷心感谢百忙中参与答辩与评审工作的各位老师，恳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个人简历

**个人简历**

xxx，x，二〇〇〇年十月生。

二〇二一年七月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二〇二一年九月进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